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14

历史知识问题

对相对主义的答复

〔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 著
涂纪亮 译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Maurice H. Mandelbaum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历史知识问题

对相对主义的答复



〔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 著

涂纪亮 译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Maurice H. Mandelbaum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美)曼德尔鲍姆著;涂纪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15747-3

I. ①历… II. ①曼…②涂…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060 号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By Maurice Mandelbaum

中文版依据 Liveright Publishing Co. 1938 年版译出

书 名: 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

著作责任者:〔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 著 涂纪亮 译

责任编辑:岳秀坤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747-3/K·062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zq@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 印张 220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

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

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青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

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 新

2006 年 5 月

译者引言

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 1908—1987), 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哲学家, 批判的历史哲学学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美国哲学界、特别是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影响。这里译出的《历史知识问题》(1938)一书是他的头一部代表作, 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受到学界的好评。其后他又出版多部著作, 如《道德经验的现象学》(1955)、《哲学、科学与感性知觉》(1969)、《历史、人和理性》(1971)、《哲学、历史和科学》(1984)以及《社会理论中的目标和必然性》(1987)等等。

曼德尔鲍姆的历史哲学观点建立在他的认识论观点之上, 因此有必要首先简略概述他的认识论观点。他明确表示, 他在认识论上持激进的批判实在论的立场, 倾向于赞同17—18世纪洛克等人主张的直接的或素朴的实在论的基本立场, 即强调物理对象的客观存在, 而反对18—19世纪贝克莱、休谟等人主张的唯心论和现象论, 不赞同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观点看作我们的意识的直接内容, 否认物理对象的客观存在。他赞同激进的批判实在论的观点, 认为科学推论能够提供关于物理对象的客观存在的信念, 物理对象实际拥有的品质可能大大不同于我们直接感知的那些品质, 但这一点绝不能导致怀疑论, 导致怀疑物理对象及其品质的客观存在。

在曼德尔鲍姆的这本成名著作中, 可以看出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实在论立场, 这就是他仔细批驳历史相对主义的怀疑论, 论证历史

知识的客观性。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表明撰写此书的宗旨：“本书想达到两个目的。它的头一个目的在于试图克服目前广泛流行的一种针对历史知识的怀疑论。它的第二个目的在于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某些重要观点作一个批判性的总结。”（《历史知识问题》，英文版，第4页；即本书边码，下同）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此书前一部分着重阐述和批驳历史相对主义，即那种怀疑、甚至否认历史知识具有客观性的观点，后一部分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关联性和因果性的关系以及历史多元论与历史一元论的对立等方面，论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此书篇幅不大，但涉及面广，这篇简短的前言不可能逐一论述此书的每个问题。为了给读者阅读此书时提供一些向导，本文首先扼要评述他对历史记述的性质、对象、方法等问题的看法，其次着重评述他对历史相对主义的批驳，最后简述他对历史多元论的论证和对历史一元论的批驳。在这些方面，尽管他的某些论点尚待商榷，但大多数论点基本正确，颇有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一、历史记述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历史记述，即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记述下来，考察历史的演变过程等等。曼德尔鲍姆反复声明历史是一种记述（account）或者说是一种叙述（narrative），历史记述不仅涉及某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涉及与这个历史事件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涉及这一系列事件的演变过程。他主张一定不要以为历史学家仅仅处理年代之类的事情，一个事件的时间框架总是比单纯的年代系列丰富得多。对历史现象的语境（context）做出规定的并非仅仅是时间，而是事件在时间中的实际模式。历史学家绝不是把事件看作一件短暂地出现于时间之中的事情，而是把每个事件既看作演变的产物，又看作演变的产生者。他说：“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系列所作的叙述性记述，……是从实际地存在事件之间的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

相互关系的角度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历史学把事件看作演变的产物和演变的产生者。”(第3—4页)

按照曼德尔鲍姆的观点,历史记述的范围包括人类的所有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历史学家从这些事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蕴涵方面来处理历史事件。与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他也强调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认为历史学家研究那些曾经在一个特定场合发生的特殊事件,自然科学家则以简明的方式表达关于某些典型的事件的判断,确定这些事件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条件的关系。此外,与李凯尔特一样,他也承认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不是绝对对立的,因为对反复出现的和典型的事件的任何表述,都依据于对至少在一个事例中发生的特殊情况所做的观察。不过,自然科学家还要从描述进展到概括,历史学家却不需要做这样的概括。他说:“诚然,历史学家以他的历史知识为依据,也可能变成社会学家,也试图对某些‘典型的’历史事件的规律做出表述。不过,作为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家的全部目的都是描述、叙述。”(第5页)

历史事件是历史记述的主要对象,因而是历史学的核心概念,曼德尔鲍姆对这个概念做了仔细分析。在他看来,历史并不是像某些历史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由许多互不相连的、原子式的历史事实组成,而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组成。他把历史事件看作一种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的历史实体,它具有某种特殊的统一性,包含有许多被称为亚事件的因素,这些亚事件通过某种存在性的依赖关系而组合为事件。他由此认为事件具有下述三个特征:“第一,事件是一个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的实体;第二,事件不是单纯的,而是包含有某些亚事件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它与这些亚事件有一种存在性的依赖关系;第三,亚事件与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事件是通过存在性依赖关系与亚事件相联系。”(第10页)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够被看作其他某个事件的亚事件,除非在后者与前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存在性的依赖关系。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没有任何事件可能被看作其

他某个事件的亚事件,除非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不过,不要把这种同时发生解释为这两个有关的事件必定处于同一个时段之内。

为了说明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曼德尔鲍姆详细考察了关联性和因果性这两个概念。他强调关联性是一个事实范畴,因为当人们说一个陈述与另一个陈述相关联或不相关联时,人们总是意指这一个陈述所涉及的事实与另一个陈述所涉及的事实相关联或不相关联,这就是说,两个陈述所涉及的那些事实是如此相联,以致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另一个陈述所涉及的事实,才能理解这一个陈述所涉及的事实的性质。因此,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取决于事实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像唯心论者主张的那样是由心灵的活动造成的。

与关联性概念相比,曼德尔鲍姆对因果性概念做了更加细致的考察。他认为事实之间的关联主要指这两个事实所断定的那些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按照通常的因果观,事件之间的关系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通常把那些引起某些变化的事件称为原因,把那些仅仅对这些变化的发生起辅助作用的事件称为条件。他主张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把原因这个概念严格地限制在一组事件,这组事件是新事件赖以存在或者在一个已经持续存在的事件中某种新的品质得以存在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他把这些条件称为新事件赖以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把整个这一组条件上称为新事件赖以产生的原因。他说:“因此,‘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存在性的依赖关系’,事件的原因是那整个一组事件,如果没有这组事件,那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第224页)

历史学家要考察历史事件和做出历史记述,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曼德尔鲍姆为此提出“外部鉴定”和“内部鉴定”这两种鉴定历史资料的方法。所谓“外部鉴定”指的是对历史文献本身的鉴定,即对文献形成的地点、时间以及作者的身份等加以鉴定。对于考察古代、中世纪等早期历史,文献资料残缺不全,外部鉴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外部鉴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更加重要的是内部

鉴定,这是一种试图确定文献的真实性的方法,包括试图确定文献的作者是否有能力对他的记述中所涉及的问题做出正确判断,在他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是否有任何因素倾向于否定他的记述,如此等等。曼德尔鲍姆主张把外部鉴定和内部鉴定都划入“分析”方法之列,不同意某些历史学家把外部鉴定看作“分析”,而把内部鉴定看作“综合”,尤其反对他们把分析与综合割裂开来,并进一步把“确定事实”的“研究型历史学家”与“伟大的综合型历史学家”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优越于前者。他说:“有时,人们以一种令人厌烦的方式把历史研究与历史综合区别开,把在历史中‘单纯地寻找事实者’与‘伟大的’(或‘综合的’)历史学家区别开。这种区别既是令人厌恶的,也是错误的。”(第226页)他强调历史学家在每种场合下都必须既采用分析方法,也采用综合方法,综合并不是一种优越于分析的研究。他说:“历史综合并不是指一个模糊不清、包罗一切的心灵框架,历史学家在它的魔力下把那些业已完成的发现组合到一起,历史综合指一种赖以认清事件的实际联系方式的能力。”(第8页)

有些人以历史著作往往需要改写为理由否认历史知识具有客观性。曼德尔鲍姆承认历史著作往往需要改写,但他对此做了仔细分析,认为不能以此为理由否认历史著作具有客观性。在他看来,造成历史著作需要改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由于人们发现了新的原始资料,推翻了以旧资料为依据的历史记述,或者发现了某些利用原有资料的新方法,这就能对原有资料做更加有效的利用,从而对原有的历史记述做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第二,历史学家不断地对原有资料进行批判性的审查,发现原有资料中的某些矛盾或空缺,因而不得不对以原有资料为依据做出的历史记述进行修改或补充;第三,历史学家从新的视角观察历史过程,提出一些新观点,并从新观点着眼去修改或补充从旧观点着眼写出的历史记述。曼德尔鲍姆把马克思提出的那种新型的经济史举作例证,认为这种新观点不仅是对历史过程的新看法,而且为其他无数的观点开辟了道路;第四,从某些新观

点做出的历史记述也并不是不可修改的,因为这些新观点也只是些作为工具起作用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不断被更新的观点所取代,从而导致以它们为依据写出的历史记述遭到修改或者否定;第五,对同时代的历史事件进行记述的历史著作往往需要改写,因为那些对身边的事件之流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历史学家,绝不能清晰地看到事件系列如何终止,因而不得不做出猜测。这些猜测可能证明为局部或全部错误,从而导致以这些猜测为依据写出的历史著作遭到不同程度的修改;第六,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事件进行记述的历史著作也往往需要改写,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看到这类事件发展过程的终极状态,因而与上述那些记述同时代的事件的历史学家那样处于不得不改写其著作的地位;第七,人们对历史记述中涉及的人物往往重新做出评价,因此不得不改写那些包含有评价的历史记述。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曼德尔鲍姆认为这只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不涉及历史事实本身,不影响历史著作的客观性。最后,他说:“我们引证了许多关于为什么必须经常重新撰写历史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因要求我们放弃关于客观的历史知识的理想。”(第309页)

二、历史相对主义

对历史相对主义的简述和批驳占了本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对于什么是历史相对主义,曼德尔鲍姆首先引用卢梭的下面这段话阐明历史相对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中描述的事实并非那些已实际发生的事实本身的精确图像;这些事实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改变了形态,它们按照某些旨趣铸造自己,它们染上历史学家的偏见的色彩。”(第15页)卢梭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曼德尔鲍姆赞同卢梭的这种评价,并做了大量发挥。他认为历史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任何历史著作直接地把握过去(或者现在)的性质,任何

一部历史著作包含的“真理”都与这部著作产生于其中的那些制约性过程相关联,只有参照这些过程才能理解这部著作。他承认,每部历史著作也如任何一种理智活动一样都受到某些心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历史相对主义的最大新颖之处在于,它主张只有把一部著作的内容与这些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把握这部著作所包含的真理。他说:“简言之,相对主义者确信要理解一部历史,我们不仅必须理解这部历史说些什么,而且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这么说。”(第19页)

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受到克罗齐、狄尔泰、曼海姆等人的支持,也受到西美尔、李凯尔特、舍勒、特勒尔奇等人的批驳,他对这些人的观点分别作了评述,认为后面这些人对历史相对主义的批驳是不彻底的。

曼德尔鲍姆仔细地分析历史相对主义者为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提出的三个论据,并逐个加以批驳。第一个论据是:历史学家不可能直接把握事件的大部分实际内容,不论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过去或者现在,也不论历史学家处于多么有利的观察位置,他都不能观察到事件的全部以及每个细节。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与他试图描述的对象接触是有限的,他不可能直接地、完整地感知他的对象,因而不可能指望历史学家做出一种完全忠实于原来状况的记述。曼德尔鲍姆承认这是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实际困难,历史学家不能包罗无遗地了解那些事实,不能重新经历和描述那些亲身经历这些事实的人所感受的全部情感,但他强调不能以此为依据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因为随着我们认识的进展,我们将发现对象的更多特征,即使对象可能具有许多我们现在不知晓而且将来也不可能知晓的特征,这个事实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信念,即通过我们已经采取的方法,我们已经获得一些确实可靠的关于这个对象的性质的知识。他说:“这个论断本身立足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根本谬误之上。它试图表明不能把任何一部历史著作看作客观真实的,因为它就其内容而言始终不像它试图叙述的那部分实际的历史过程那样完备。这个

谬误在于它试图把我们关于某个对象可以说已获得的知识与那个对象的全部特征等同起来。这样一种等同根本不符合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领域的性质。”(第 83—84 页)

第二个论据是:历史相对主义者声称,一切历史记述都是对历史过程的歪曲,因为历史记述所记述的那种连续性和结构并不是历史过程本身具有的。这个论据采取两种形态。一种形态以一些据说是经验的根据为依据,声称历史过程不具有任何结构,在历史著作中呈现出来的结构是历史学家添加的。曼德尔鲍姆举出一些经验事实证明,就直接经验而言,被我们看作历史过程的东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结构和连续性的特征。例如,任何一部关于某种制度的演变的记述都遵循一条通过一些前后相继的阶段而显示出来的叙述线索。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参照对某一事件的性质做出规定的那一系列事件,去理解这一事件的具体性质,这项任务本身就保证每部历史著作都必然表现出结构和连续性。”(第 26 页)

另一种形态是有些人(如布莱德雷等)以某些形而上学的论据为依据,声称历史记述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历史过程的结构和连续性进行歪曲。他们强调就知识而言,如果不参照一个陈述在其中被表述出来的那个时代,就不可能确定这个陈述的真假。曼德尔鲍姆认为,历史相对主义者关于任何历史记述都不可能和历史事件的实际结构与连续性相符合的论断,正是立足于他们坚决主张要参照知识在时间方面的起源来观察知识这个观点之上。他把这种观点称为“知识的历史主义”,认为“这种形态的历史主义是那种认为历史著作的结构和连续性不能反映历史过程本身的结构和连续性这样一种论证的基础”。(第 89 页)

在曼德尔鲍姆看来,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知识的内容与用以表述知识的活动混为一谈,也就是把陈述与判断混为一谈。历史记述是陈述,而不是判断,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从事的工作是如实地把历史事件陈述出来,而不是对历史事件做出判断。因此,“一部历史

著作的真实性就在于它所作的陈述的真实性,而不在于作者依据哪些根据做出判断这个事实。”(第181页)他认为一个陈述的真假取决于它所说的话是否符合于它声称要陈述的事实。对在其中做出陈述的那些条件所做的社会学解释,与对陈述本身的真假所做的评估毫无相似之处。

曼德尔鲍姆还认为,这种观点隐含一种使知识成为不可能的无限后退。因为,如果我参照一个陈述形成于其中的那些条件来评估这个陈述,那我就必须参照那些对我自己的陈述做出规定的因素来评估我的陈述,如此又引出一个必须以如此方式进行评估的另一个陈述,如此进行下去,直至无穷。他说:“一旦主张必须参照一种知识形成于其中的那些条件去理解和评估这种知识的有效性,那么彻底的相对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把这个信念表征为相对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第113页)

第三个论据在于历史相对主义者强调一切历史判断都含有价值,因而而不可能是客观地有效的。这个论据可以采取多种形态,例如,它可能用经验的方式表明,个别历史学家的个人偏见或文化偏见对事实作了歪曲或误解。但更加普遍地采用的是下述这种形态,即认为历史学家用以把握往事的活动是一种解释活动。解释活动在这里意指把一些特殊的“事实”统一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每部历史记述都带有那个起统一作用的解释原则的痕迹,这个原则正是历史学家活动的产物。相对主义者认为对事实的解释来自主体,而不是主体所考察的资料的性质把解释加之于主体,解释是主体对其对象的兴趣的一种反映。

与此相反,曼德尔鲍姆认为,主体的那些对其历史解释进行指导的兴趣是对某些超验的文化价值所作的一种普遍的和必然有效的认可,因此历史记述本身不会被相关的评价因素所歪曲。他说:“在那种场合下,每个历史记述尽管受到价值的指引,但就下述意义而言仍然是客观的,即这些历史记述被所有其他历史学家看作是‘真实